

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

王齊樂著

教
育
史



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

王 齊 樂 著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BY

波 文 書 局

PO WEN BOOK CO.

HONG KONG

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

編著者：王齊樂

出版發行：波文書局

PO WEN BOOK CO.

香港灣仔道二三四號地下

234, Wanchai Rd., G/F, H.K.

5-753618 753690 721195

發行人：黃孟甫

印刷：嶺南印刷公司

香港西安里十三號地下

定價：港幣三十五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八三年二月初版

李 璜教授序

語云：飲水者應思其源，而吾輩治史者論事亦當究其始，方足以明文化必發源甚遠，而其流乃得以暢，此王君齊樂之所以有《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之作也。王君爲香港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第一屆研究員，以香港中文教育發展之始末爲論文，經予披閱，評爲甲等第一，因得中華民國教育部授以文碩士學位。王君早在香港教育司任學官職務有年，公餘之暇，對於香港教育史事，興趣特濃，經年累月，耳濡目染，兼收並蓄，復加以統計，列表以示一百年間（一八四一至一九四一）香港中文教育之發展詳況。予以其論文資料之翔實，已可稱爲第一手，而他人所不及見者。況王君復從歷史回顧之中，推源及於香港九龍遠古地下掘得之史前文物，以證明港、九接連大陸，自古即爲中國人之社會，遺有文物，足見根源。雖自古稱爲一漁村耳，然自北宋以來，九龍錦田區中，即已有“力瀛書院”之設立，其後歷經數朝，各地相繼有大小學舍之設立，爲數不少，故自宋代開始，九龍區中即已有科第人才逐次出現，而至清代尤盛。因之，港、九自古即爲中國文化陶鎔之地，而英人開埠之後，始能造成香港爲中西文化交流之媒介，而用以開放廣東新學人才之蜂起。王君此見，可稱卓越，於其列表按年紀一中西文化交流之要事，其跡遂歷歷可尋也。

抑有進者，予嘗閱及黃季陸先生所主編之《國父年譜二編》上册圖片十頁中山先生手寫自傳墨蹟影印，其中有中山先生致翟理斯教授之書，書中有云：“於中學獨好三代兩漢之文，於西學則雅癖達(爾)文之道……”似此兩語，已不但足見中山先生中文造詣之深，且復見其人身即已代表出中西文化交流之蹟。中山先生學醫於香港，其於港地文風必於數年之間，有所感染，得益於中國學問或者不少。據王君列表所示中山先生於一八九二年秋，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而在此之前，列表所示：一八七二年理雅各博士翻譯《四書》、《五經》為英文，全部完成；一八七四年曾負一時文名之《循環日報》創刊；一八八〇年《維新日報》創刊；一八八二年有政府書館三十九間，補助書館四十一間，其八十所中有六十四所是純中文書館；一八八五年《粵報》創刊。……是亦可以藉識中山先生之求學環境，利於成為中西滙通而不世出之偉大人物也。

凡此王君列表中之扼要處而予取其一隅，已足徵香港中文教育之發展及其影響之大。然尤為予欣賞者，王君以一專節敘述而稱許陳子褒先生，以大學問而自編中文教科書，開中文新式教學之先河，是誠有識之士，唯王君其能發此潛德之幽光。至於金文泰以一英人殖民地官吏，而能醉心中國文化，提倡中文教育，不遺餘力，王君令予一再審之，不能不加以欣賞，如對理雅各之於中國經書翻譯，其有功於中西文化之交流，殊途而同功。憶昔康、梁之講求變法維新，以開啟中國新學新政之端倪，梁啟超即於清代三百年學術史中，曾稱其師之新政主張以至大同思想，初亦感受香港之新書報之介紹西事西政，蓋梁氏所舉之《華字日報》，在王君列表中，固創刊於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也。

王齊樂君初呈此一論文，對予之認識香港中文教育，已大有補益，而喜其用力之勤，持見之確，特予推薦於故所長羅香林先生；羅所長名史家也，一讀即加以讚許。不幸香林逝去，予亦退休赴美閒居。在後此數年中，王君並未停止充實其論文之內容，而增其書之第七章《回顧與前瞻》，二、三兩節之《大事年表》與《大事紀要》，使予更一目了然進展之跡及其中間之波折處。至第四節，其對香港中文教育前途之希望，亦有見地，足資思考。王君此書，乃一專史也，但梁任公先生於其《歷史學方法論續編》，曾論及專史，中有云：“專史雖曰專於一人一地或一學，然而寫專史者，如能逐類旁通，亦足以令人更趨於博識。”予於王君此書，亦有是感，故願爲之介紹於史學界中。

李 璜 於台北中央新村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吳俊升教授序

余曾寄跡香港二十餘年，近半時間承乏新亞書院校務。與香港政府教育員司，多所接觸。其中頗多謹飭文雅之士貽余深刻印象者。其著者如高詩雅（D.J.S. Crozier）、唐露曉（P. Donohue）、毛勤（L.G. Morgan）諸教育司官，皆出身英國知名大學，富文化修養，對中國文化有認識，並具尊重心。雖稟承其政府之政策處理教育行政，但對在香港為延續並發揚中國文化而艱苦締造之新亞書院，頗多同情維護，使能獨立發展而成為中文大學基礎學院之一。其間經過，余所親歷。至今迴溯，猶令人感念，而諸君則已先後作古矣。教育司署主管專上學校之員司，為錢清廉、韓慶濂兩博士，與余在國內有舊，於公務上亦多贊助。惟余與中小學行政人員接觸則較少。有之，惟視學官王齊樂校長。余始知王君，由於王君為書法家，偶於友人處見余所書條幅而謬賞之，亦索余書，因而結翰墨因緣。余以是懸知王君雖廁身教育行政事務，亦一風雅士也。迨後，王君於業餘復入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隨羅香林（元一）、李璜（幼椿）兩教授治史學，而以《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為論文專題。余嘗被邀謬主其論文評審與口試，因而親識王君，而上下其議論。其人果然文雅博洽，證余向所懸測者為不謬也。王校長既以優異通過碩士論文考試，復不亦自限，繼續研究，就其

論文加以增訂與潤飾而成專書。書成復不遺在遠，萬里馳書，屬余序其端。此書初稿余既曾寓目，並參加鄙見，此次覆按，益覺內容精審為難得之佳作。故略述所見本書之特點以諗讀者，誼不容辭也。關於香港教育史事，以往雖間有述作，但作有系統之編次與論述，成為專書，此為始創。本書之特點此其一也。王君以教育行政官主持香港各夜中學多年。香港教育為彼所親自參與。以局內人記述局內事，由於具有第一手資料，故所述多詳實而可靠。本書之特點此其二也。過去及現在香港各師資訓練院校講授香港教育史，均始自英國統治香港，而不探本溯源及於中國本土之教育與文化。此固政治之限制使然，但於香港教育之歷史背景不明，則所訓練之師資，對於香港教育發展之實際了解，遂不免狹隘敷淺矣。王君治香港教育史獨能高瞻遠矚，探其本原，而上溯中國本土之文化背景及教育發展，其博洽通達，實屬難能可貴。本書之特點，此其三也。猶有進者：香港離中國而為治，已百數十年。中國教育史家對於此間教育之經過均存而不論。但此四百餘方哩之土地及五百多萬之人民，終屬吾土吾民。不論國際現勢之發展如何，將來終有重歸祖國之一日。將來撰述中國教育全史者，將以王君此書補其空白，則王君對於中國史學之貢獻為不小矣。本書之特點，此其四也。本書具此四特點，可稱得未曾有之佳作。余樂於觀其成，故為此以弁其端。余書至此，頓覺過去二十餘年余在香港所涉之人與事，連類而歷歷呈現於目前，更不得不感謝王校長此作能使余重溫香島之舊夢也。是為序。

辛酉年春月八一叟 吳俊升 序於美國西部太平洋之濱

陳耀南博士序

許多有生命的著作，都起源自一種使命感。譬如司馬遷的撰述《史記》，就爲了要踵武父祖的遺業，要克盡太史的職責，要紹述周、孔以來的文化傳統。王齊樂先生寫這本《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我覺得，也是出於一種使命感——作爲教師的所見所聞，作爲教育官的所職所務，特別是，最重要的，作爲一個中國文化繼承者的所傳所守。王先生熱情而又冷靜地，把百數十年來此地的中文教育，怎樣在由“唐文”而“漢文”而“中文”這三個不同稱呼所代表的理念之下，在港英政府小心而又冷漠的處理之下，在一代又一代有心人的辛勤灌溉之下，艱苦地成長。王先生對早期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著名牧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理雅各（James Legge）努力溝通中西文化，對金文泰（Cecil Clementi）總督時期官紳合作，重視中文，那短暫而美好的歲月，對香港教育和中國大陸政治文化的密切關係，對港英政府長期重英輕中政策的由來與影響，都特別致意；在平和委婉，不愠不火的行文之中，透現出嚴正的態度和超卓的見識。

王先生可說是文如其人，這是有幸識荆以來，我的感覺。說起來，早在幾年前，還未認識王先生，便已在《華僑日報》教育版上，拜讀到他有關香港著名塾師陳子褒先生的大作。那

時我在港大中文系擔任語文通論一科，講到清末民初白話文運動時，特別留意一些有關的人物和資料，於是，王先生親切翔實的文章，便在我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對這位自稱為“婦孺之僕”的平民教育家，康、梁維新運動的同情者，王先生是深致景仰的；而子褒先生的亮節高風，也因作者誠懇的生花妙筆，而更加彰顯。這篇文章，後來就是本書的第五章第二節。至於書中述及香港大學中文系當初成立的經過，以及所由成立的目標，在於傳揚整體的中國文化，促進中、英關係，而不單以灌輸零碎的歷史知識，訓練工具性的語文和翻譯技巧，特別是金文泰總督“香港大學的盛衰，視乎中文之興替”的名言；此刻仍然是港大中文系的一名教師，而前此又在馬禮遜、理雅各長校的“英華書院”任教十年的我，識荆有緣，執筆拜序，撫今追昔，自然在感慨之外，更加一番親切了。

寄慨深遠當然是著作的成功條件之一，不過，除此以外，還要講究工夫與技巧。許多理據充足，考證精詳的著作，都取材自豐富的書面資料，再加上實際的經歷和訪問。《史記》又是一個好例子。石室金匱的皮藏，功令檔案的記載，大梁、淮陰、豐鎬的訪問，以至扈從封禪，參與制曆，一切所聞所思，透過史公神奇的鎔鑄鋪排，都成了偉大著作的一部分。王先生這本《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由八百多年前，錦田鄧符協創辦“力瀛書院”，把中華文化一脈南延開始，而清初新安縣寶安、文岡等書院，而開埠早期的港島私塾，而培植時期的教會學校，特別是各時期中，中國學術典章對本地中文教育的影響，前代科舉取士制度之下的傑出人物和貢獻，吉光片羽，王先生都搜羅爬梳，不遺餘力。北至沙頭角，南達赤柱半島，都印遍他訪尋研究的足迹。許多早已幾乎湮沒無聞的學舍、家塾，都因王先生的努力而潛德幽光，得以再發。“尋墜緒之茫茫，獨

旁搜而遠紹”；“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王先生的勞績，真是令人敬仰了。

王先生辛勤多載寫成的《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洋洋數十萬言，確是一本鯁理分明，內容充實的好書，一本關心中文教育，關心香港教育，以至關心香港前途的人，爲了窮源竟委，爲了鑑往知來，所均宜細讀的好書。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尤其是負責學校行政，推展教會或者社團辦學的負責人，更當人手一冊。倘若讀了本書，而更加感發興起，更認識到中國國運、中國文化和香港中文教育的不可分離，更體會到“人必自尊而後人尊之，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的道理，那王先生的辛勤和苦心，就不是白費的了。

王先生的努力，是並不白費的：香港中文教育全盤的、系統的編述，這是第一本。其中有作者實際參與的親切經驗與心得，有與中國教育文化根源聯繫的探索；而整個研究，都可作爲中國教育全史的一個重要部分。這都是本書的價值所在。替這本好書寫序，是一個十分榮幸的任務，我是非常樂意接受的；並且希望，不久之後，王先生再賈其餘勇，把本書最後一章的第三節——“一九四一年以後的香港中文教育”，擴展成爲續編，那就更嘉惠士林了。

一九八一年聖誕節

陳耀南 敬序於香港大學中文系

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中文教育的涵義	1
第二節	香港教育的背景	9
第三節	香港前代文化活動的史實	19
第四節	資料的蒐集與研究	28

第二章 香港的前代教育

第一節	宋代錦田的力瀛書院	35
第二節	清代新安縣的著名書院	41
第三節	清代舊學舍探索	47
第四節	本區域的歷代科第人物	69

第三章 啟蒙時期 (1841—1859)

第一節	初期的中國傳統學塾	82
第二節	最早期的教會學校	94
第三節	教育委員會的努力	113
第四節	官立學校的發展	120

第四章 培植時期(1860—1900)

第一節	教會學校的活躍	131
第二節	理雅各的教育革新計劃及其中國經典翻譯	141
第三節	補助學校計劃的施行	157
第四節	英文教育日形發展下的中文教育	179

第五章 開展時期(1901—1920)

第一節	二十世紀初期的中文學塾	192
第二節	平民教育家陳子褒及著名塾師簡介	210
第三節	香港教育的開展	243
第四節	新教育的產生和發展	263

第六章 勃興時期(1921—1941)

第一節	金文泰時代的香港中文教育	283
第二節	香港大學中文系的創設	299
第三節	師範教育的建立和發展	315
第四節	中文教育的勃興	330

第七章 回顧與前瞻

第一節	歷史的回顧	358
第二節	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大事年表	366
第三節	一九四一年以後的香港中文教育大事紀要	376
第四節	香港中文教育的前途	394

本書插圖

1. 新界錦田的周王二公書院…………… 49
2. 新界大埔的善慶書室…………… 52
3. 新界沙頭角的鏡蓉書屋…………… 58
4. 新界沙頭角的靜觀家塾…………… 60
5. 九龍寨城的龍津義學…………… 65
6. 革新香港教育及翻譯中國經典的理雅各博士…………… 142
(Rev. James Legge, D. D.)
7. 中央書院首任掌院兼政府監督學院史釗活先生…………… 146
(Mr. Frederick Stewart, M. A.)
8. 中國學者王韜先生…………… 154
9. 擔任政府教育首長的歐德理博士…………… 171
(Dr. E. J. Eitel)
10. 香港荷里活道的文武廟…………… 202
11. 平民教育家陳子褒老師…………… 211
12. 櫻花先生何恭第老師…………… 226
13. 一九一六年的陳氏家塾師生合照…………… 232
14. 極力提倡中文教育的總督金文泰爵士…………… 286
(Sir Cecil Clementi)
15. 唐文大先生宋學鵬老師…………… 288
16. 官立漢文中學校長李景康先生…………… 293
17. 香港大學中文學系主任賴際熙太史…………… 301
18. 香港大學鄧志昂中文學院…………… 306
19. 香港大學馮平山中文圖書館…………… 308
20. 香港大學中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教授…………… 310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中文教育的涵義

香港自從開埠以後，百多年來，華洋雜處，商旅繁集，漸發展而成爲東方的主要商港；同時，四方人文，薈萃其間，也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樞紐。

生活在這地方的人們，不論是居民或爲過客，他們相互之間，來往言詞，應用書契，藉以溝通思想，表情達意的，皆以中、英兩種語文爲主。而香港人口之中，歷年以來，又以中國人爲絕大多數，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以中國語文的流通最廣，運用最大。

香港的中國語文，從歷史的進程上，在稱謂方面，約可分爲三個時期：

（一）唐文時期

從一八四一至一九〇〇年左右。在這時期內，本港的外國人，通稱中國人爲“唐人”。在他們的心目中，所謂“唐人”，其特徵便是女的纏足；男的雜髮，頭戴卜帽，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

那時，在書院中讀英文的，稱為讀番書、寫番文、學番話；讀中國書的，則稱為讀唐書、習唐文、寫唐字。學塾中教授中文的老師，稱為“唐書先生”【註一】。在一九二五年左右，以教授金文泰總督學習中文著稱的宋學鵬，也還被稱為“唐文大先生”。

（二）漢文時期

在一九〇〇年以後，已普遍改稱唐文為漢文。一九〇四年，皇仁中學有“復設漢文”這回事。同時，這時期《黃龍報》所登載的，幾篇以中文寫作的文章，也多用“漢文”一詞，並稱那時的中文老師為“漢文教習”。當時之所以改稱“唐文”為“漢文”，大概與外國人之熱心研究“漢學”有關。對中國學問的研究，既稱“漢學”，那麼，中國文字，自然便稱為“漢文”了。這是很合理的稱謂。

一九一四年，政府設立漢文師範於官立實業專科夜學院；一九二〇年又設立漢文師範學堂；一九二六年，金文泰總督為提倡漢學，更設立官立漢文中學一所，以漢文視學官李景康為校長；政府設立的小學，其中有幾間也稱為漢文小學。

（三）中文時期

一九三一年以後，中國僑務委員會成立，本港僑校，紛紛向中國政府呈請立案，並參加廣東教育廳所舉辦的中學會考。這樣一來，為了適應國內課程，對中文科的稱謂，便漸漸與國內一致。“漢文”一詞，也漸而被“中文”所代替了。

及至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始以後，廣州學校遷港的不少，學生、教師及文化人士，也大量進入香港，大家均以“中文”為中國語文的正確稱謂，把本地的“漢文”觀念，大大的沖淡。甚而在戰後設立的中學會考，也稱為“中文中學會考”，近年成立的一所大學，也稱為“中文大學”了。

我們從香港歷史上，唐文、漢文、中文的三種稱謂，正可以看出中文在香港發展的三個不同的時期，並代表了三個不同的時代意義。唐文時期，是代表中國傳統舊教育的時代；漢文時期，是受外國教育影響的時代；中文時期，則是受祖國及時代的影響，推行新教育的時代。

語言，是人與人之間，直接交換思想，表達意見的工具；文字，則除了代替語言的作用外，是傳播和紀錄文化活動的主要工具。語言和文字，都是一種傳播的工具，只是文字比語言，更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吧了。而語文是各有其民族形式的，任何一種民族語文，都是一種民族文化的產物。中國語文，自然是中華民族經過長時期的創造和發展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產物了。

所謂中文，是指中國人相沿習用的一種語言文字。凡是中國人，在生活習慣上，自小即習用這種語文，成為自己的一種母語。在香港，一位中國人，即使是精通英文的，他的英文，也絕不可以完全代替了自己的母語，因為他到底是一個中國人，他和他的民族文化、生活習慣、社會關係等等，有著極密切的血緣關係，而且是息息相關的。也可以說，他的生活意識，和他自己的民族及社會所給予的教育，有深厚的關係。

教育的基本目標，不外是知識的傳授與人格的培養。關於後者，我們中國的教育比外國教育，更為重視。甚麼叫做中文教育呢？簡言之，凡是以中國語文作為教學的主要媒介，以達成教育的目標的，便是中文教育。

在中國國內，所實施的教育，根本就沒有所謂“中文教育”或是“外文教育”之分。凡是學生，在開始求學的時候，一律接受本國語文的訓練，以中文為學習的基礎，為學習知識的媒介。一個人除非不接受正式的教育，要接受正式教育，首先學